

“德福一致”何以可能

——“加速社会”中的德育危机与理念再造

张彦 李岩

【摘要】“德福一致”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也是诸多思想家一直关注和思考的经典命题。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马克思等，无论是“解释世界”的范式还是“改变世界”的范式，都彰显出道德、幸福、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功能维度来看，德育是实现“德福一致”的一种重要方式；从规范维度来看，“德福一致”是德育的重要价值导向。在“加速社会”中，以“德福一致”为价值导向的德育面临着三重危机：以价值秩序的重构为特征的价值危机、以自治承诺的违背与多重异化为特征的环境危机和以“去同步化”病状为特征的实践危机。应对这三种德育危机需理念再造，其中，“共鸣”理念可为理解和实现“德福一致”以及现代德育发展提供一种关系性维度和新规范，“后增长社会”理念从缓解德育与外部环境的同步化压力出发有助于解决道德困境和幸福困境。

【关键词】德福一致；德育；加速社会；共鸣；后增长社会

【作者简介】张彦，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岩，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杭州 310058）。

德育是一项崇德育德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一项对实现人类幸福有所助益的教育活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先贤都强调德育所培育的美德有利于实现城邦共同体的幸福；中世纪前后，奥古斯丁(Augustinus, S. A.)、阿奎那(Aquinas, T.)等神学家们则认为，德育通过教导人们热爱上帝有助于接近由上帝眷顾的永恒幸福；到了近现代，卢梭(Rousseau, J. -J.)、洛克(Locke, J.)、杜威(Dewey, J.)等思想家们主张德育所培育的自由个人能够更加积极地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因此，德育是实现“德福一致”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德福一致”和德育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时代的变迁和现实的社会情境对“德福一致”和德育的时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德国当代批判理论家罗萨(Rosa, H.)看来，当代社会是被科技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以及生活节奏的加速共同笼罩的“加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参照群体、交流伙伴、物品、想法和工作等等都是如此快速地变化”^[1]。这一社会诊断继承并发展了诸多思想家对现代社会特征的思考。比如，处于“早期现代”的卢梭认为，社会中的诸多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并自己摧毁

自己”^[2];处于“经典现代”的马克思(Marx, K.)将现代社会描述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3];处于“晚期现代”的鲍曼(Bauman, Z.)将现代性称为时间力量战胜空间力量的“流动的现代性”^[4]。因此,“加速社会”的社会诊断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特征,为我们从时间维度上理解并解决“德福一致”以及德育的现实困境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一、“德福一致”与德育:理解方式与内在关系

“德福一致”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也是诸多思想家一直关注和思考的经典命题,它与德育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但对“道德”和“幸福”的理解、对“一致”的理解、对“德福”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一致的理解,深刻影响“德福一致”的可能性和实现性,也深刻影响着德育问题的理论拷问与时代诉求。马克思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中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这实际上反映出两种哲学思维方式:以“解释世界”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以“改变世界”为核心的思维方式,而后者更具革命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两种思维方式同样体现在西方哲学家对“德福一致”问题的理解上。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们在解释“德福一致”的意蕴方面作出了大量的探索,颇具启发性。而马克思则一直致力于“解释世界”基础上的“改变世界”,强调在现实的革命运动中理解并实现一种美好的生活。根据马克思的理解方式,以实现“德福一致”为一种重要目标的德育要关注生活世界,将分析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化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应对之道作为重点任务。

(一)以解释“德福一致”意蕴为核心的理解方式

对“德福一致”问题,康德(Kant, I.)曾系统总结出关于德福关系的两种理解方式即分析论与综合论。从实质内容上来说,其能够被解读或者转换为关于解释“德福一致”的两种理解方式。其中,分析论将道德与幸福按照同一律的方式理解为包含关系。斯多亚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实质上就是以这种分析方式理解德福之间在逻辑上的联结。斯多亚学派继承了苏格拉底对至善问题的理解,将成熟的理性视为人真正的自然本分,认为只有“完善的或健康的理性所追求的美德是惟一真正意义上的善(至善)”^[6]。但是,斯多亚学派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个人对幸福的追求,而是主张一个具有美德的人将得到完全的幸福,因而幸福并不存在量上的增减。与斯多亚学派针锋相对,伊壁鸠鲁学派主要是从人必要的自然欲望出发,主张追求人生的快乐,期求消除“人的不安全感、对死亡的害怕及其错误逃避”^[7],强调快乐和幸福才是至善。伊壁鸠鲁学派竭力批判斯多亚学派对道德的理解,后者认为“某种行为之所以正当、值得赞美,只是因为它是获得快乐生活的一种手段”^[8];而对于伊壁鸠鲁学派来说,所谓道德

就是能使人幸福和快乐的一种手段。对于以上两派的观点，康德分析指出，他们都“遵循着同样的方法的，但在它们从两者之中对基本概念作不同的选择上却又是互相分歧的。伊壁鸠鲁派说：意识到自己的导致幸福的准则，这就是德行；斯多亚派说：意识到自己的德行，就是幸福”^[9]。在康德所指认的此种理解方式之下，“德福一致”在形式上指向道德与幸福的统一，道德与幸福乃是同一类事物。而在实质内容上“德福一致”则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样态：以成熟理性所追求的美德为核心的“德福一致”和以感性欲望所追求的幸福为核心的“德福一致”。根据这种理解方式，以培育道德为根本的德育与幸福便具有紧密的关联，德育直接指向幸福，“德福一致”的实现内蕴在德育过程之中。

与分析论不同，综合论的思维方式将幸福与道德理解为在实践原则方面不同性质的要素。康德运用这一思维方式即按照因果律的分析方式理解德福关系。在康德看来，幸福只是出自一件事物的实存的表象的愉快，它主要建立在主体的感受性之上，而不属于知性和理性。尽管幸福让人愉悦，但康德认为，“自身幸福的原则，不论知性和理性在其上可以有多少运用，对于意志来说却只不过包含有与低级欲求能力相适合的那些规定根据”^[10]。与此相对，道德法则是纯粹理性基于意志自由而提供给我们的普遍实践法则，它不受经验性的制约，而是超感性的实践理性法则。道德的本质就是自律，道德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它自身。既然道德与幸福分属不同的领域，两者便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那么，“德福一致”便无法在综合论思维方式的意义上获得合法性。在康德看来，道德尽管是最高的善，但并不是至善即“德福一致”，对于纯粹实践理性来说，道德应该配享幸福，也即，使人的幸福按照其德性的比例配享而得。“德福一致”并非是偶然的和不可实现的，它具有客观实在性和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的存在必须基于两大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如此来，康德便将“德福一致”存在的合理性诉诸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证明的悬设，由此，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一至善的可能性。然而，康德指出，德性必须被教授，这就为实现“德福一致”提供了德育这种现实路径。康德主张通过“道德判断力训练”、“范例与模仿”、“道德问答法”等方法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自身的理性，从而在内心中获得道德律，形成履行义务的动机。此外，康德不赞成苦修，他强调“人自己加给自己的管束(纪律)只能通过伴随管束的愉悦感成为值得称赞的和示范性的”^[11]。也就是说，德育应是伴随幸福感的过程。

康德所提出的两种理解“德福一致”的思维方式具有启发性但并不全面，其要么将道德与幸福理解为同一类事物，要么将二者视为完全不同的两类事物，因此所形成的“德福一致”要么比较片面，要么比较苛刻。实际上，在康德以及其所论及的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之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对“德福一致”问题已有大量的论述，并且呈现出与之不同的思

维方式。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性是人通过积极运用灵魂中的理性所呈现出的值得称赞的品质。根据运用理性的程度，德性被划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两个部分。关于幸福，亚里士多德主要从目的论的角度予以分析。从目的论角度来说，人的每种实践活动都以某种善为目的，而目的之中也有区别，其中存在着最高目的，它是自足的，不以其他目的为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最高目的就是幸福。而所谓的善就在于人们所从事的活动的完善，在这些活动中，积极运用灵魂中的理性即具有德性的活动是人类独有的特殊活动。因此，“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12]。幸福就是合乎最完善德性的实现活动。至此，“德福一致”的意蕴得以呈现出来。概言之，幸福的真正意蕴与德性密不可分，它由最完善的德性所界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幸福与德性是同一的，二者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区别。首先，德性主要是一种品质，有德性的人并不一定开展行动。其次，幸福也需要一定外在的善，比如运气、财富、友谊、健康等，因为没有外在善的帮助很难做到合乎德性的事情。因此，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德性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而并不是幸福本身，“德福一致”主要是建立在德性与幸福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基础上。这显然与康德所分析的两种理解方式是不同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幸福在于人们采取合乎德性的行为。然而，这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其次，他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并且是因那行为自身故而选择它的。第三，他必须是出于一种确定了的、稳定的品质而那样选择的。”^[13]而关于德性的知识、选择和品质都需要通过教育的方式获得，这凸显了德育之于德性和幸福以及“德福一致”的重要性。

客观而言，在亚里士多德、康德及其所分析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之间存在三大共同点：第一，主要以抽象的个人及其活动作为逻辑原点论证人们至高的生活目的或至善；第二，主要从感性和理性的思辨维度抽象地谈论道德与幸福及其关系，忽略道德与幸福在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与历史性；第三，将重心放在解释何为“德福一致”这一问题，对“德福一致”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及其克服缺乏考察。他们所论证的“德福一致”没能展现出充分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维度。

（二）以改变“德福一致”困境为核心的理解方式

与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理解有所不同，马克思突破了传统的以“解释世界”为核心的哲学范式，建立了以“改变世界”为导向的新哲学范式，其在伦理学方面实现了从“形式伦理学”向“实质伦理学”的转变^[14]，为理解“德福一致”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从而也对加强德育的时效和实效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一，马克思并未从感性与理性二分的抽象维度去解释个人，而主要从物质生活的维度说明“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明确指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5]。从需要的角度来说，这些现实的个人与动物不同，不仅具有衣食住行等物质性需要，也具有包括政治、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等社会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它们表征着人的需要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和形式上的多样性。相比于动物，人是自由自觉的类存在，通过劳动等手段不断将这一类本质外化出来。从这个层面上说，幸福就是一种通过劳动实践等方式满足人们不同层次需要的过程和结果，并在其中感受到自由的充分发挥。道德作为其中的高层次精神需要，以及自由的充分体现构成幸福的必要条件，它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主要起着规范作用，彰显人的自由和尊严。

第二，马克思认为道德和幸福并非是永恒的和绝对的，而是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6]。道德和幸福作为现实的个人追求丰富需要的结果，其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过程，因此它们的内涵和意义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幸福的观念层面和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其本身“没有历史，没有发展”^[17]，它们只是物质生产生活的历史产物。这种历史性也意味着道德和幸福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递进性，因为对于历史，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也就是说，过去的条件和理解方式会对现代的人们对道德和幸福的追求和理解造成持续性的影响。

第三，马克思对至善问题并不感兴趣，或者说马克思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理解和识别人们生活的最高目的，而是在发现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及社会制度的改善，以提升个人乃至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换句话说，“现实的个人”和人类历史都是在社会中发展起来的，道德和幸福的实现必须基于对具体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考察。马克思也正是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才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社会构想。

在这种理解方式下，“德福一致”的意蕴就在于，有道德的人得到幸福以及道德与幸福的和谐统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但由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的历史局限性，“德福一致”作为理想状态不会必然实现。而且，正是因为它是一种理想状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将生活实践的结果与此理想状态作比较、衡量和评价之后，往往会作出“德福不一致”的结论。因此，“德福不一致”的现实问题既是客观社会问题，也是主观理解问题。对此，人们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改革和教育活动，在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不断促进这一理想的实现。马克思的见解对理解“德福一致”问题所带来的启发是：必须从传统道德哲学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回

到现实生活中去，着眼于现实生活中阻碍“德福一致”的问题与病症，并通过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加以改变。因此，“德福一致”是伦理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的统一。

（三）“德福一致”与德育的内在关系

根据上述，无论以何种理解方式来看，“德福一致”都彰显出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致力于提升人类道德水平的教育实践活动，德育在逻辑上与“德福一致”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从实质内容上来说，它主要关涉教育与道德、幸福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功能维度来看，德育是实现“德福一致”的一种重要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通过学习、某种习惯或训练而获得的”^[19]。德性的获得也是如此。康德认为，“德性能够并且必须被教授，这是从它并非生而具有得出的”^[20]。因此，人们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获得道德和幸福，而德育就是获得道德的主要方式。“德福一致”的核心意蕴表明道德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在此意义上，德育同时具有促进幸福的功能。正如有学者所说，德育主要“通过发展与完善人的道德品质，满足了人的一种精神需要”^[21]。这种精神需要的满足能够带给人们持久的幸福感。此外，德育也能够通过使人正确认识幸福的真谛，即幸福的核心在于道德的方式促进幸福的获得。因此，德育客观上能够帮助人们实现道德与幸福的和谐一致。

其次，从规范维度来看，“德福一致”是德育的重要价值导向。无论人们如何理解幸福，对幸福的追求被普遍地视为人的内在目的和人之为人的价值特性。费尔巴哈(Feuerbach, L. A.)认为，“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22]。因此，作为一项促进人的生存与完善的事业，教育也应将幸福作为自身重要的目的和价值导向。正如诺丁斯(Noddings, N.)所言，“幸福应该是教育的目的，而一种好的教育就应该极大地促进个人和集体的幸福”^[23]。德育作为教育的核心部分，它也应将幸福作为自身发展的价值导向。然而德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不同，它更强调道德之于幸福的重要意义，即应将“德福一致”作为自身重要的价值导向。

然而，“德福一致”的不同理解方式会影响我们如何进一步看待上述关系，因而影响“德福一致”的实现和德育的发展。如果按照康德等人的理解方式，“德福一致”将只是一种抽象的规范标准，缺乏现实观照和社会的内生动力，因而无法真正引领德育的现实发展，德育也无法有效促进“德福一致”的实现。实际上，由于社会的局限性，传统社会及其德育对“德福一致”的追求偏于道德侧，强调反求诸己，幸福只限于少数特权阶级或宗教人士。只有到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幸福或“德福一致”在理念和现实中才真正普及于人民大众。马克思以历史思维和现实逻辑赋予道德与幸福鲜明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斗争性，为我们正确理解“德福一致”问题提供了更为科学和更富启发性的思维方

式。在此理解方式下，德育将“德福一致”作为价值导向的核心意涵在于，德育应通过自身的教育实践活动“引导生活的建构”^[24]，教育人们通过道德的生活追求幸福的人生目的，从而实现道德与幸福的和谐统一。在此过程中，分析和诊断现实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特征是德育发展的根本性基础，这也是促进“德福一致”的重要前提。德育要时刻关注自身所处的社会情境，善于识别现实的社会情境及其对实现“德福一致”所造成的阻碍，并及时找到解决方案。

二、德育在“加速社会”中的三重危机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方式，从历史发展规律出发，识别现实的社会情境并分析其对“德福一致”和德育的作用是推动德育发展的重要基础。从马克思、韦伯(Weber, M.)、涂尔干(Durkheim, E.)等古典社会学家，到维希留(Virilio, P.)、哈维(Harvey, D.)、鲍曼等当代社会学家，他们基于各自时代的时间诊断，不同程度上将加速作为现代社会的内在动力和重要特征之一。到了21世纪，加速的趋势、特征、弊端更为显著，这使得关于加速的系统理论分析成为可能。罗萨继承了马克思的思维方式以及前人的理论成果，结合当代西方发达社会的加速发展状况，创立了系统的“社会加速”理论及其相应的批判理论。罗萨的批判理论总体指向“美好生活”问题。确切地说，罗萨批判理论的主题是分析“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为什么生活不美好”以及“如何实现美好生活”。因此，尽管罗萨没有对“德福一致”作过直接的分析，但是幸福和道德问题历来就是人类美好生活的重要内涵，“德福一致”与美好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罗萨的理论能够为我们理解社会加速对“德福一致”和德育的影响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想视角和实践启示。

在罗萨看来，社会加速是现代社会时空情境的重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可被视为“加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加速形式——技术的加速和由于时间资源的短缺而导致的生活节奏提高——(以结构和文化为前提的)相互连接，并且因此也存在着增长和加速。”^[25]也就是说，“加速社会”主要由加速逻辑和增长逻辑共同主导，它们推动着加速机器不断运转和升级。在“加速社会”中，德育主要面临三重危机：价值危机、环境危机与实践危机。

(一) 价值秩序的重构：德育的价值危机

“德福一致”是德育的一种价值导向，它规定着德育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排序，即有利于实现“德福一致”的德育行为被视为有价值的，并按照有利程度进行价值排序。如果这一价值导向被弱化，就会影响德育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排序，从而产生德育的价值危机。

价值排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在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行动安排并不是随意的，

而是遵循着一定的顺序,“排序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手段,能够将行为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评估,并且排列: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事情最先做,之后是次等重要的,以此类推,而不太重要的事情要在还有时间资源可供使用的时候再去完成”^[26]。在传统社会,时间分配和价值判断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分配主要围绕价值判断展开。但是,随着时间力量的逐渐增强,加速成为社会的主导动力,时间分配与价值判断就分离了,随之带来了“价值体系的双重化”:一方面,人们仍然拥护具有较高价值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找不到与此相应的价值顺序的反映。实际上,这代表着时间的力量已经逐渐战胜了价值的质量,不是价值,而是期限或者速度,成为确定行为顺序的标准,由此,传统的价值秩序就被时间和速度干扰并重构了。

加速弱化了“德福一致”的价值。在时间稀缺和有限的条件下,“德福一致”的价值被这种新的价值排序原则弱化了。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有利于实现“德福一致”的行为逐渐淡出视线,如开展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交流、参加公益活动等,因为优先完成这些事情的负担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过重了,它们大部分情况下只会给人留下什么都没有做的不确定的感觉,这让现代人感到恐慌和焦虑。因此,人们常常会做“灭火”的事情,优先做那些与最终期限相关的事情,如工作、学习中的定时任务,以及能够得到快速满足的事情,如玩游戏、看电视等,而不再能够去构想并实践长期有价值的目标,甚至拒绝去实现它们。即使有些人做的事情符合“德福一致”的价值,但他们可能只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完成的,其结果和质量令人担忧。

“德福一致”价值的弱化造成了现代德育的价值危机。“德福一致”作为德育的价值导向理应具有价值优先性,德育应以此为原则开展具体的实践活动,然而加速带来的时间压力造成时间优先性逐渐替代了“德福一致”的价值优先性,随之影响了德育的具体实践过程。这在学校德育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严格遵守现代时间规范的组织之一,学校中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要按照时间表有序开展。正如福柯(Foucault, M.)所说,在学校组织中,时钟、时间表等时间利用的新技术被用于“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调节时间、肉体和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27]。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人的成长规律,破坏德育自身的时间结构。在时间规范的严格规训之下,人们尽管能够意识到“德福一致”与德育的价值,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不断挤压德育时间,优先考虑能够快速产出成果的智育。在德育课程的专有时间内,因为随时面临下课铃声的催促,有些教育者将有利于把控和节约时间的教育内容排在优先的位置,而将那些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严肃的哲学审思过程的德育内容放在后面,这削弱了受教育者对德育的满足感与获得感。

（二）自治承诺的违背与多重异化：德育的环境危机

“德福一致”作为德育的一种价值导向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理想状况，但是，它的对立面不能仅被狭隘地理解为“有德无福”或者“有福无德”的“德福不一致”问题，也应该包括“德”与“福”的共同缺失。德育是推动“德福一致”实现的重要方式，如果社会整体环境和氛围也是趋向道德和幸福，那么，社会环境与德育将形成合力，实现“德福一致”也会事半功倍。但是，如果社会整体环境与此相违背，那么，社会环境就会削弱德育的效能，从而阻碍“德福一致”的实现，产生德育的环境危机。

一方面，加速因违背现代性的自治承诺而引发道德困境。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一般将自治作为道德生活的基础，人们普遍认为“所有正常的个体都同样有能力按照一种自治的道德生活在一起……照此观点，我们所有人都同样有能力明白，对我们自己来说，道德需求些什么”^[28]。加速在现代化过程中曾是自治的动力，自治被视为现代性的承诺，这是因为社会的加速发展能够提升人的自主性，为个人的自主发展和道德生活提供丰富的机会和条件。但现实表明，加速对自治的推动力在“加速社会”中逐渐趋于瓦解，自治承诺已被破坏，“人们已经体验到加速的力量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是成为一种奴役人们的压力”^[29]。在这种压力下，人们逐渐失去自我掌控的能力，主体建立道德目标、价值、典范的能力逐渐丧失以及进行道德反思和道德判断能力不断衰减，自律的道德生活让位给由时间规范界定的道德准则，由此个体的自治能力不断被削弱。如果说，现代道德的基础是自治的话，那么由加速带来的自治困境也随之造成了现代道德的困境。

另一方面，加速也造成多重异化状态，产生幸福困境。由加速所造成的异化主要是指“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亦即一种主体处于、‘坐落’于世界当中的方式遭到了扭曲”^[30]。人们置于世界之中，必然形成一定的世界关系，包括人与社会世界、客观世界以及主体世界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且易于形成亲切和熟悉的感觉。但是，由增长逻辑和竞争逻辑控制的加速伴随着时空的分离、社会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强、生活节奏的加快等特点，导致人们与过往熟悉的空间、物体、行动、时间、自我和社会不断地相互疏离，甚至造成“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31]，从而造成多重异化状态。对现代主体来说，“这个世界(包括主体)已经变得沉默、冷淡、漠然，甚至令人感到憎恶”^[32]。这显然未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幸福，反而造成了深深的焦虑和痛苦。

道德困境与幸福困境破坏了社会环境，造成德育的环境危机。首先，很多现代国家将自治作为德育的核心价值取向，强调“承认和尊重个人道德选择的权利，侧重引导学生形成独立自主的道德推理和判断能力”^[33]。显然，在道德根基被破坏的社会环境中，德育的育德功

能将被削弱。其次，在“加速社会”中，无论是德育工作者还是德育的受教育者，都存在被异化状态包裹住的可能性。以幸福为导向的德育工作者自身可能陷入时间压力和生存焦虑，受教育者也同样如此。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教育的双方容易形成沉默、冷淡、漠然的异化关系模式，由此，将可能进一步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材料之间形成“异化三角形”。以“异化三角形”形式出现的德育实践的特点是：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材料之间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言语和交流的，而且，他们以冷漠、排斥和敌对的态度面对对方。^[34]在此情况下，德育至关重要的精神互动和话语互动过程将遭到停滞，德育价值与内容的内化之路将被阻塞。

（三）“去同步化”病状：德育的实践危机

所谓“去同步化”病状是指由不同速度模式导致的摩擦与矛盾。社会各领域在加速的动力和程度方面是不同的，如“在教育和政治领域中的变化速度和革新速度要比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这些方面的速度慢”^[35]。在“加速社会”中，这种速度差异更为明显，其带来的“去同步化”病状激化了德育的内外矛盾，造成了德育的实践危机。德育作为实现“德福一致”的重要方式，德育的实践危机也削弱了其促进“德福一致”实现的功能。

加速增加了德育与其外部时空环境的同步化压力。德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事业，使社会和国家的道德要求与个人的道德素质保持相对的同步和协调是德育的应有之义。然而，道德素质的提升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人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反思性的存在，并不会被动地接受由教育者灌输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至少要经过受教育者的反思和比较才能决定其是否能够得到认同，而这些过程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但是，科技、经济等领域的加速发展不断形成诸如网络空间道德问题、基因剪辑技术造成的伦理困境、自动驾驶汽车的道德难题、保险行业的道德风险等新的道德问题，对人们已有的道德观念造成巨大的挑战和冲击，并且由于不适应这些新的道德问题，人们极易产生道德困惑和思想危机，而这些都亟待德育的及时回应与解答。德育效果的产生需要持续性、长期性的时间投入，即使科技和经济的加速能够在硬件环境和教学材料方面为德育提供支持以提高德育的效率，也无法使“加速社会”中的德育及时跟上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快速变化并解决其带来的道德问题，从而可能出现德育暂时“失语”的情况，国家与社会的道德要求与个人的道德素质之间的鸿沟存在加深的危机，而这种“去同步化”造成的矛盾也会随着加速程度的提高逐渐激化。而德育的滞后发展及其实践效能的弱化，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德福一致”的实现。

同时，德育与外部时空环境的同步化压力也激化了德育内部的矛盾。一般来说，德育的内容既包括道德和价值的知识层面，也包括相关的情感、观念、意志层面以及相应的行动层面。它们对于实现“德福一致”来说缺一不可，但在速度结构方面存在差异性。知识的获取

和情感的熏陶相对容易且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得到提升。但是人们的内在观念、意志和行动却不易改变并具有相对稳定性，其提升速度较为缓慢。这些层面之间的速度结构差异往往导致彼此不协调，如“知行不一”现象的出现，其是德育的内在矛盾，德育工作者实际上可以通过时间弥补这一差异。但问题在于，德育与外部时空环境的同步化压力也导致了德育内部压力的增强，这使得德育更加关注时间。而时间在“加速社会”中已成为一种稀缺商品，节约时间和珍惜时间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准则。“将生活方式通过类似时间禁欲主义加以系统化和纪律化”^[36]成为现代生活安排的核心要素。在此种时间规范和时间纪律之中，德育面临着巨大的时间压力，适用于科技、经济领域的工具理性和竞争逻辑不断侵入德育世界，这加剧了德育的内在矛盾，一定程度上造成德育内容的混乱和紧张，这会削弱德育在实现“德福一致”方面的作用。

最后，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加速甚至也扭曲了“德福一致”的核心意蕴，使其单一化和片面化。加速意味着单位时间内数量和质量变化的增加，这促使人们不断追求世界范围的扩增以及资源的增加。随着加速动力的不断增强，“试图让世界变得更能被调遣、被支配、被触及”^[37]的战略主导了社会的文化想象。在这一社会文化想象的主导之下，人们对道德和幸福的理解被扭曲，道德的关系性意蕴被弱化，主体性被过度强调，资源的增加和对世界范围扩增的感觉主导了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德福一致”被局限在主体的向度内，从而忽略了“他者”或世界的向度，人们也由此逐渐丧失了对存在的另一种看法的能力。“德福一致”意蕴的改变，也影响着德育的发展，使其更加强调对主体能力的培育，相对忽略对“他者”或世界的观照。

三、“共鸣”与“后增长社会”：现代德育的理念再造

我们之所以不断强调“德福一致”及其与德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德育主要是一种精神和价值层面的塑造和培育过程，正确的文化导向和价值导向对德育的良性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而加速扭曲并破坏了“德福一致”这一德育的价值导向，因此，为现代德育再造一种与“德福一致”意蕴相契合的新的文化范式和价值理念成为抵抗加速的治疗方案。此外，“加速社会”背后的增长逻辑和资本逻辑是推动加速并且造成德育危机和“德福一致”问题的根源，因此，为现代社会再造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范式和社会发展理念是破解德育危机和促进“德福一致”实现的基础。

（一）“共鸣”理念为理解“德福一致”提供一种关系性维度

“如果加速是问题所在，那么共鸣可能是解决方案。”^[38]“共鸣”理念，是罗萨针对加速造成的文化危机所提出的治疗方案，因此，它能为破解“加速社会”中的德育危机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具体来说，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实现“德福一致”的新思路，从关系维度

和规范性积极引导德育发展。

罗萨提出“共鸣”理念的目的是应对加速对美好生活的扭曲和破坏，旨在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生活规范标准或伦理基础，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传统。作为批判理论的奠基人，霍克海默(Horkheimer, M.)认为，批判理论的目标就是“在批判、反叛、否定社会现实中追求社会的公正合理，以求得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39]。可以说，人类解放、幸福、美好生活是早期批判理论所确立的理论目标和实践旨趣，而这一理论目标被罗萨所继承。其中，“共鸣”被罗萨理解为人类的一种基本能力和内在需要，这种需要表现为人对回应性关系和互动性关系的渴求。人的主体性和社会主体间性基本上是通过建立“共鸣”关系而发展起来的，在缺乏回应性经验的情况下，人类的身份建构和社会性的形成基本是不可能的。^[40]同时，人的这种回应性是双向的，既包括外部世界向主体的回应，也包括主体向外部世界的回应，而且这种回应建立在双方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因此，回应并不是简单的回音，而是能够产生变革效果的反馈。作为一种生活规范标准，“共鸣”理念蕴含着鲜明的关系特质，它反对道德的纯粹主体导向与幸福的单一资源取向，更加强调人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性，“共鸣”关系被罗萨视为美好生活的核心意蕴。因此“共鸣”理念的建构具有价值重塑的意义，它尝试解决加速对道德和幸福的扭曲和破坏，使人们更加关注道德和幸福所蕴含的人与世界的良性关系及其对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为人们理解和实现“德福一致”提供了新思路，有利于重新将“德福一致”等价值的优先性建立起来。罗萨认为，“共鸣”关系的构建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社会领域以及个人，在构建“共鸣”关系的过程中存在差异。因此，“共鸣”理念符合现代社会对多元性和个性的追求，使“德福一致”的实现具有更强的可能性。

“共鸣”理念为现代德育发展提供一种新规范。“共鸣”理念所认同的教育既反对以提高自我修养为核心目标的教育理念，也反对以改造世界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理念，它的核心目的是培养人与世界之间的“共鸣”关系。因此，“共鸣”理念作为理解和实现“德福一致”的新思路，能够为德育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规范标准。具体来说，罗萨强调，“共鸣”只有在一个基本上陌生和沉默的世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生。^[41]因此，对于德育来说，教育者不能期望受教育者具有同样的道德素养和道德能力，也不能追求完全和谐一致的教学氛围和教学效果，这样的教育方法是家长制作风，无法产生“共鸣”。教育者应尊重不同的声音，肯定矛盾与争论，正确引导互动过程。但矛盾和争论并不代表仇恨，“仇恨是排斥，是相互伤害，会破坏‘共鸣’”^[42]，德育应积极化解教育过程中的仇恨、排斥等不良情绪。此外，“共鸣”教育过程涉及三个要素：教师、学生与教育材料，三者之间构成的“共鸣”关系被罗萨称为“共鸣三角

形”，它抵抗的正是加速所造成的“异化三角形”。一般来说，建立“共鸣三角形”需要四个条件：第一，教师与学生之间要建立起有效的互动关系，彼此感兴趣并能在互动中感受到自我效能感；第二，教师需要建立起对教育材料价值的信任，或使教育材料对教师具有吸引力；第三，学生必须公开接触教育材料，愿意参与其中并被其所感动，而且必须相信他们能让材料有变化；第四，学生之间要形成开放的、良好的互动关系。^[43]这些条件的设定和说明对于德育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共鸣”理念的指导下，德育过程应该注重建立教师、学生与教育材料之间的“共鸣三角形”，以此克服加速造成的德育危机。需要强调的是，在“共鸣三角形”的构建过程中，教育者即教师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教育作为一个揭示世界的过程始于教师的兴奋，教师在某种程度上起着第一个音叉的作用。”^[44]德育过程应该首要关注教师的榜样作用，教师应该主动发挥其引导与鼓动作用，对学生的需求、情绪和兴趣做出敏感的反应，帮助学生与教师和材料之间建立起“共鸣”关系。

（二）“后增长社会”理念对道德困境和幸福困境的开解

“共鸣”理念的构建所解决的问题是加速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但这并未触及“加速社会”本身，如果不解决“加速社会”背后的逻辑，“加速社会”中的“德福一致”问题和德育危机是无法有效解决的。对此问题，罗萨也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即提出了“后增长社会”这一社会形态范式，它蕴含着新的发展理念，从而能够为破解德育危机奠定基础。

“后增长社会”理念改变了传统的增长模式，致力于解决资本逻辑的剥削机制，有利于缓解德育与外部环境的同步化压力。“加速社会”根本上是由增长逻辑和资本逻辑推动的，在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时间优势的获取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劳动时间是衡量劳动力和商品价值的生产要素。以获得和剥削“剩余价值”为目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求生产速度、流通速度、消费速度的不断提升，即增加单位时间内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数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科技、社会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加速，并导致时间的稀缺和时间压力的增强。也就是说，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社会的增长模式是一种“强迫性增长”模式。对此，罗萨提出了“后增长社会”理念，它主要指“一种总是能够增长、加速或创新的社会形态，以便朝着期望的方向改变现状(例如，为了克服短缺或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为了维持体制现状和结构上的自我复制而被迫升级”^[45]。“后增长社会”理念强调以“适应性增长”模式取代“强迫性增长”模式，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旨向。在此意义上，“后增长社会”理念有利于引导社会朝向高质量发展，而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以此减轻社会的加速强迫力和德育的时间压力，缓解德育与外部环境的同步化压力，修补德育再生产的能力。

在增长逻辑和加速逻辑的共谋之下，对落后的恐惧和生存的焦虑成为社会存在的主导形

式，而恐惧和焦虑在神经学层面是同理心、同情心的“杀手”，不利于人们采取合乎道德的行为，也让人们身陷痛苦。在这个意义上，“后增长社会”理念努力寻求对“生存的安抚”，它尝试通过无条件保证基本收入的改革思路使这种对生存的安抚成为可能。基本收入有可能在必要的体制改革和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它的吸引力不在于承诺社会和人民生活能够逐步改善，而在于它可以将世界上的基本生活方式从斗争转变为安全，从而消除生存的焦虑和“社会性死亡”。在罗萨看来，在不被迫增加资源的情况下获得资源是调整我们生活方式的先决条件。基本收入的作用是保证在世界上保留必要的份额，而不使其受到侵蚀。

^[46]因此，它将允许行动者放弃世界范围扩增战略，转而采取符合“共鸣”理念的生活方式，从而为道德和幸福生活奠定基础，为“德福一致”的实现提供基本保障。因此，它也让德育的社会环境更为美好，使德育主体在安全、健康的氛围中实施德育行为，使德育实践与社会环境产生正向合力，有助于解决道德困境和幸福困境，推动“德福一致”的实现。

至此，我们从德福关系的维度将“德福一致”视为德育的价值导向。通过辨析关于“德福一致”的不同理解方式，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解方式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概言之，我们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于解释“德福一致”是什么，更应该回答“‘德福一致’存在何种现实困境”以及“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比较恰当的方式理解德育与“德福一致”之间的密切关系，才能真正在此价值导向的指引下推动德育发展。针对这些问题，罗萨对“加速社会”的诊断、对“共鸣”理念和“后增长社会”理念的建构，为我们分析现代社会中的德育危机以及探索德育发展的新理念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方法启示。由于“加速社会”中的增长逻辑和资本逻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罗萨所提出的“共鸣”理念和“后增长社会”理念作为解决方案，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同样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罗萨的相关分析对中国德育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25][26][35][36]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83、83、161—162、135、62.
- [2]卢梭.新爱洛伊斯[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228.
- [3][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470—471.
- [4]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 [5][15][16][17][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519、295、525、157.

- [6]王来法. 前期斯多亚学派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189.
- [7]汪子嵩, 等. 希腊哲学史(修订本)(第四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225.
- [8]西塞罗. 论至善和至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8.
- [9][10]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39—140、28.
- [11][20]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注释本)[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58、251.
- [12][13][19]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0、44、25.
- [14]张盾. 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伦理学问题[J]. 哲学研究, 2004, (5).
- [21]鲁洁. 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92.
- [2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543.
- [23]内尔·诺丁斯. 幸福与教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 英文版序, 1.
- [24]鲁洁. 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 引导生活的建构[J]. 教育研究, 2010, (6).
- [27]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177.
- [28]J. B. 施尼温德. 自律的发明: 近代道德哲学史(上册)[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4.
- [29][30][32]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110、117、147.
- [33]任志锋. 权威与自治: 美国学校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发展[J]. 教学与研究, 2019, (12).
- [34][38][40][41][43][44][45][46]Rosa, H.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M].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6. 409, 13, 293, 295, 413—414, 412—413, 727, 729—731.
- [37]哈特穆特·罗萨. 分析、诊断与治疗: 晚期现代社会形态的新批判分析[J]. 江海学刊, 2020, (1).
- [39]王凤才. 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上)——对批判理论三期发展的批判性反思[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2, (6).
- [42]Rosa, H. & Endres, W. Resonanzpädagogik[M]. Weinheim: Beltz Verlag, 2016. 78.

How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Morality and Happiness" Is Possible: Moral Education Crisis and Concept Reengineering in the "Accelerating Society"

Zhang Yan & Li Yan

Abstract: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morality and happiness" is an ideal state of life pursued by people, and a classic topic that many thinkers have been concerned about. All the paradigms used to "explain the world" or "change the world" by Aristotle, Kant, Marx showe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happiness and education. Functionally, moral education remain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morality and happiness"; normatively,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morality and happiness" is an important value ori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accelerating society", "moral education guided by the value of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morality and happiness" is facing three crises: the value cris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rder of value,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characterized by both the violation of the commitment to autonomy and multiple alienation, and the practice-oriented crisis characterized by "desynchronization". To deal with these moral education crises, we need to rebuild new concepts. Among them, the concept of "resonance" can afford a relational dimension and a new norm to understand and achiev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morality and happi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oral education; the concept of "post-growth society" helps to alleviate the synchronized pressure from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solve moral and happiness-related dilemmas.

Key word: consistency between morality and happiness; moral education; accelerating society; resonance; post-growth society

[责任编辑: 刘洁]